



徐晓望◎著

闽商研究

MinShang Yanjiu

中国文史出版社



徐晓望◎著

闽商研究

MinShang YanJiu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商研究 / 徐晓望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034-4393-0

I. ①闽… II. ①徐… III. ①商业史—研究—福建省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7072 号

责任编辑: 雷 鸣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1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CONTENTS

闽商三论	1
论唐代的闽越遗风与闽人的海商传统	10
论闽商与宋元上海周边港市的妈祖信仰	20
关于泉州蕃商蒲寿庚的几个问题	33
明清时期福建儒商并重的文化传统	44
明代漳州商人与中琉贸易	52
严启盛与澳门史事考	70
福清叶向高家谱列传研究 —— 一个沿海商宦世家的衰荣	86
论明代福建商人的海洋开拓	96
论明代葡萄牙人在漳州的贸易及东亚历史的拐点	107
郑芝龙家族与明代澳门的闽商	123
闽商与晚明日本市场的开拓	134
明末台海海峡的福建商人与荷兰殖民主义者	148
论明清福州城市的发展及其重商习俗	164
明清闽北商帮研究	175

清代闽西连城商人及其慈善事业 191

闽商与明清时期烟草的流播 201

澳门妈祖阁碑记与清代泉州、澳门之间的贸易 231

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 241

论闽商发展的阶段性和主要特点 256

主要参考文献 264

闽商三论

闽商不是中国商人集团中最显赫的商帮,却是延续性最长的一个商人集团。它初兴于晚唐五代,成长于宋元,在明清时期壮大,在近代走向世界,在改革开放后登上新的高峰。闽商——它是一个扎根中华,面向世界,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久盛不衰的商人集团。

一 从“男耕女织”到“女耕男商”

中华文化发源于中原的黄土地,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汉人,并不擅长经商,他们有重农轻商的文化传统,最崇尚“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形态。然而,两晋及唐代中叶以后北方的战乱,使他们无法安居于故乡。于是,他们扶老携幼,向南方迁徙,其中许多人进入闽中,并与当地的闽越人后裔融合,形成了新的福建人。翻开闽人的族谱,其开篇部分一定是说其祖先南迁入闽艰难过程。对于闽人皆说其祖先从北方南下这一点,福建的学者曾表示怀疑:难道南方的闽越男人就没有后裔吗?所以,有一段时间,人们总是说闽人的族谱,关于其祖先的来源,应有些伪托的成份。近年的DNA研究表明,今日闽人中的男性,95%以上都是北方人的血缘;而福建的女性,90%以上是南方血缘!福建人,是“北男”和“南女”的组合。福建人的文化同样呈现南北结合的特点,不仅继承了北方的汉文化,还吸收了南方的闽越文化,从而成为中华文化中富有特色的一支地方文化。

所有到过福建的游客,都承认福建女性的能干。她们下田劳动,上街经商,经济收入不亚于男人,甚至更胜于男人。其实,这是福建自古以来的传统。在闽越人居于多数的时代,其男女分工与汉族不同,汉族的特点是“男耕女织”,而越人的特点是男人打仗、女人耕作、经商。也就是说,越人之俗,女人养家,男人在外面闯祸。男人之间的战争,使男人伤亡率较大,所以,《汉书·地理志》说江南“多女而少男”,其原因在于“江南卑湿,丈夫多夭。”战国时代成书的《周官·职方典》则谓:“扬州之民,二男五女。”其时,闽中属于扬州,女性绝对过剩。古代从北方南下的多是男性,他们进入闽中之后,便与南方女性结合,形成了新一代的闽人。北方

汉人一直以勤劳闻名,他们没有染上南方男人喜逸恶劳的毛病,而是勤恳地下田劳动,形成了“男女并作”的组合。“笑说福唐风俗恶,一田夫妇两身泥”^①;“种麻卖布皆贫妇,伐蔗炊糖无末游”。^②南宋时,祝穆说福州:“市廛田陌之间,女作登于男”。^③何乔远说泉州“妇女芒屨负担,与男子杂作”。^④兴化府的妇女能干男人所做的一切事。民国《莆田县志》记载:“他邑国民责任皆男子负之,惟莆则男妇并重。田野妇女皆能躬耕,深山妇女皆能樵采。沿海妇女皆能捕鱼,家谕户晓,不烦督促,此全国所未见也。”^⑤其实汀州妇女能干不亚于沿海,杨澜的《临汀汇考》:“闽中风俗之俭,至于妇女务勤劳,无若永定者。每旦戛至锅蓐食,披衣衽,抹花帕罩髻。少长,什伍为侣,樵采一二十里林莽崖谷间,造夕阳衔山,各荷薪刍而返。虽衿绅儒士家不仗婢仆。凡负贩、舂汲、种作、缝纫之事胥自任焉。妇女不能佐子夫衣食成立者,群起非笑之。”^⑥清代一个外省官员作总结:“闽妇最勤苦,乡间耕种、担粪、砍柴等事,悉妇女为之,单裙赤足,逾山过岭,三五成群,有头插花枝而足跣肩负者。”^⑦由于要参加田间劳动,福建妇女不缠足,清初旅游福建的王澐说:“泉漳之间,弓步绝迹。殆南越之遗俗欤。”^⑧其实,泉州与漳州的妇女中,也有一些是缠足的,不过,那只限于大家闺秀。对这些地区妇女来说,缠足是一种“奢侈”的习惯,平民家庭无法供养这些高贵的“娇女”,因而,她们即使羡慕小脚女人,也没有办法模仿。明清时代,缠足习惯流行全国,但在福建受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福建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的广泛性。

其实,福建女性除了下地劳动外,还能上街经商。元代的儒者陈普有一首名为《古田女》的诗,咏及古田女性在街头经商:“插花作牙侏,城市称雄霸。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吾闽自如此,他方我何暇?”^⑨该诗统括了古代福建妇女的习俗。她们下田劳动、上街经商,为了家庭,她们抛头露面,在所不惜。这种习俗一直到明清时期仍保留在福建的许多地方。

① 陈藻:《乐轩集》卷一,田家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7页。

② 陈藻:《乐轩集》卷一,渔溪西轩,第6页。

③ 祝穆《方輿胜览》卷十,福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宋本,第2页。

④ 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42页。

⑤ 张琴等:民国《莆田县志》卷二一,农业,福建省图书馆藏抄本,第86页。

⑥ 杨澜:《临汀汇考》卷三,清光绪四年刻本,第26页。

⑦ 彭光斗:《闽琐记》,福建省图书馆藏1980年手抄本,第18页。

⑧ 王澐:《漫游纪略》卷一,闽游,江苏古陵出版社1983年笔记小说大观本,第3页。

⑨ 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十六,古田女。此处录自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页。

自南宋以来,福建沿海便成为地少人多的地方,人均占地不到一亩,许多人家只有几分地,光靠农业劳动,无以为生。于是,福建人将女性留在家中,男性到异乡谋生。何乔远说:“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背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别识。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①李光缙也说:“吾温陵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已及笄,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②

明代泉州这种“女耕男商”的习俗,逐渐传播到福建各地,成为闽人的传统之一。在这些地方的人看来,男人留在家中是可耻的,“好男儿志在四方”,男人一成年,就要到异乡谋生,他们家中的活,全部由女性包揽。文革之前,福建沿海的许多乡村都找不到壮年男性,下田劳动是女人,下海捕鱼是女人,乃至乡村各级领导,都是女性。对他们来说,男人,只是过年过节才回乡的那一些人。说实在的,没有家乡的女性支撑家庭,福建的男性绝不可能在外面的世界闯出一片天下。闽商的崛起,首先取决于他们特殊的家庭结构——“女耕男商”。

二 闽商与海洋

如果说中国每一个商人集团都有其经营主业,徽商赖以生存的是盐业,晋商发家之本业是票号,闽商的根本在于海洋。

中国是一个海岸线较长的国家,然而,在中国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于长江以南迄至珠江口的黄金海岸线,也就是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四省,其中,又有闽粤二省居于重要地位。在民国时期,中国在外的华侨多数是福建、广东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在闽粤二省中,又以福建人较早从事对外贸易。这有其历史原因。

闽人和粤人历来是中国海洋运输业的主体,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左思的《吴都赋》就说:“篙工楫师,选自闽禺”。此处的“禺”是指“番禺”,即指广东。这说明吴国战舰的水手中,有许多闽粤人。在东晋末年,孙恩及卢循的五斗米教流行于闽浙沿海,卢循后来组成了数十万人的水师,他们乘着数百艘艨艟巨舰,一度打到金

① 何乔远:《镜山全集》卷四八,寿颜母序,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第12页。

② 李光缙:《景壁集》卷四,史母沈儒人寿序,第726页。

陵城下。孙恩、卢循所依靠的基本部队,就是闽浙沿海的水上人家。卢循失败之后,这支水上人家一直活动于闽浙沿海,被史家称为“游艇子”。在隋代,他们一度支持王国庆等人的叛乱。《太平寰宇记》记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麦、细陵等。并受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盗。贞观十年,始输半课。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鸟了船。”^①这些“白水郎”,即为后世的“厝家”。

如上所述,厝家人一生都生活在船上,他们在台湾海峡的岛屿上航行,对中国沿海的航线十分熟悉。实际上,他们还向东南亚航行,所以,迄今为止,东南亚诸国还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厝家人族群。唐宋时期,北方汉族大举南下闽浙沿海,与厝家人相互融合,因而也继承了厝家人的海洋文化,从而揭开了中国海洋文化的灿烂一页。

在东南黄金海岸线的江浙、福建、广东三个地区,福建对外贸易的条件其实不如广东和浙江。广东的珠江口正对南海的南端,来自南亚和西亚的商船过了马六甲海峡之后,便可随着南风北上广州。广州商人要做对外贸易,只要在广州码头上摆一张钱桌,就可收购南亚商船送来的香料等南方商品;浙江的宁波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港口,每年的东北风都会送来朝鲜与日本的商船。福建的港口北不如浙江,南不如广东,地位十分尴尬。然而,这一状况也迫使闽商到海外贸易,主动争取贸易机会。早在唐宋时期,福建人就开始了出海贸易。他们北上宁波,然后从宁波出航朝鲜和日本。据朝鲜人所著《高丽史》的记载:五代两宋时期从宁波到高丽的中国商人,大多是泉州人与福州人。乃至苏轼在其奏疏《论高丽进奉状》中说:“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记载,北宋从海上出使高丽的使者,是在宁波雇佣了福建商船,其水手皆为福建人。其时,福建商人也常到东南亚各国贸易,成为经营东南亚商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福建商人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起这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当时对外贸易以招揽海外商船为主,广州和宁波的商人都能在自己的码头收购海外商品,所以将危险的出海贸易让给了福建商人。宋朝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市舶司最大的“德政”就是让泉州的富人下海经商,并让他们招来外国蛮夷进贡。如若不从,要课以重税。在市舶司的逼迫下,造船下海成为福建沿海的习俗。为了完成官府的使命,他们到海外,首先想办法诱惑当地酋长到宋朝进贡,自己也顺便做些生意。福建纲首蔡景芳历年贩

^①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二,泉州,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影印宋本,第129页。

卖海外宝货,官府收息达 98 万贯。^①“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贾之于外蕃者未尝有是。”^②“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货二万万”。^③在他们的带动下,许多外籍商人随船到泉州贸易。其时,福建的人口要比广东多,经济也比广东繁荣,不论是丝绸还是瓷器,福建都有许多精美的产品。所以,外商来到泉州,能采购到比广东更好的商品。这样一来一往,外籍商人都习惯性地到泉州来经商。某年,大食巨商蒲罗辛载乳香至泉州,官府抽解得 30 万缗^④,这类商人还很多。叶廷珪《海录碎事》:“百蛮之賁,五天之珍,每岁山积”。^⑤这样,泉州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在宋元之际,泉州已经成长为东方第一大港,引起马可波罗的羡慕。尤其是在元代,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汇聚于泉州,使泉州人的商业文化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

明朝实行的海禁,使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明朝所设三个市舶司中,宁波市舶司因日本人滥用武力最终关闭;福建市舶司贸易对象只剩琉球一个,不能满足福建商人的需求;即使是广州市舶司,也因官府限定东南亚诸国的进贡次数而受到制约。对于地大物博的明朝来说,对海外商品的需求量不大,所以,即使限制对外贸易,也无碍国内的商品流通。因此,明朝的海禁之令下达后,在各省都得到贯彻,山东、江南、浙江的对外贸易基本断绝,福建与广东境内,则屡屡爆发反抗事件。仔细排列《明实录》及福建地方志的记载,可以从中得知:即使在明朝海禁最严厉的时期,也未能禁绝漳州人的“通海”行为。事实上,明朝的水师不是漳潮海上武装的对手,他们不仅在海上多次战败,而且,他们所盘踞的水寨,也经常被海盗们围攻。^⑥更为糟糕的是,明朝漳潮地方官不是将这种状况如实地上报朝廷,许多时候是瞒报,或是尽量轻描淡写,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反正朝廷的官员高高在上,难得下去视察。这样,明朝严厉的海禁网络在闽粤边界被撕裂了一个缺口,此地的民众通过非法或是合法的关系,进行私人海上贸易。朝廷对这些“天高皇帝远”的地区视而不见,无可奈何。更因为其他地区的对外贸易都因海禁而停顿,促成了中国私人海上贸易控制于漳潮人手中的状况。

①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九,北京,中华书局 1957 年影印本,第 3373 页。

② 方略:《兴化军祥应庙记》,陈衍:民国《福建通志》,《福建金石志》卷九,民国刊本,第 11 页。

③ 洪迈:《夷坚志》,《夷坚丁志》卷六,泉州杨客,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点校本,第 588 页。

④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九,第 3373 页。

⑤ 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一二,市舶门,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680~681 页。

⑥ 徐晓望:《明代漳州商人及其与朝廷关系的调整》,《闽南史研究》,海风出版社 2004 年,第 201~202 页。

明代中后期,明朝允许福建的漳州开放月港进行对外贸易,而广东潮州因海盗活动猖獗,对外贸易受到官府的压制。明代的广东官府采取“许进不许出”的政策,就是允许外商到澳门贸易,但不许广东人到海外贸易。这与福建官府“许出不许进”的政策刚好相反。福建的月港允许福建商人到海外贸易,但不许外商到福建贸易。不同的政策导致双方的对外贸易发展趋向不同,福建商人大举出国,成为东南亚、东亚各港口中国商人的唯一代表,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定居于外港,成为中国最早的华侨。由于福建商人与殖民东南亚各国的欧洲商人往来较多,他们还成为欧洲商人与中国贸易的主要中介人。南安人郑芝龙是他们中间最杰出的代表。

广东方面,由于官府禁止广东人出海贸易,所以,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表现为广州及澳门口岸的对外开放。其时,葡萄牙商人乘机在澳门建立据点,控制了广东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不过,他们对华商业主要依赖福建商人为其中介。所以,广东的对外贸易逐渐落入福建商人的掌控之中。

可见,正是因为明朝的海禁,给福建商人垄断中国对外贸易带来了机会,而福建商人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领域中的佼佼者。一般认为,明末清初的海洋是福建人的时代。

清朝在统一台湾之后,取消了海禁,中国沿海各地的海洋文化得以发展。然而,由于明初至清初三百年的海禁,各地传统海洋文化消失。多数地区的人们,已经不懂造船和航海了。在这一背景下,福建人大举北上和南下,在各地建造天后宫及码头。就中国的海岸线来看,广东沿海各港口,皆为福建移民居住区域,至今以闽南话为主;海南岛的状况也是如此。而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广州城,清代的广东十三行闻名天下,就其籍贯而言,他们大多是闽人。例如在鸦片战争前红极一时的伍秉鉴,号称世界最富的商人,他就是福建同安人。在浙江,沿海岛屿及港口的居民,有三分之二是闽人;清代的上海港,其航运业长期由闽人控制;在山东的烟台、青岛诸港,福建人建造了大型天后宫,辽宁沿海的天后宫,也多是福建商人的作品。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福建人垄断海洋事业的状况延续很久,直到清代中叶,广东官府才开放口岸,允许广东人出海谋生,迨至清末,广东籍华侨才超过福建人。而浙江人大举出洋,则是在民国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福建又走在出海闯天下的前列,在美国、日本等国家,闽籍华侨数量都是最多的。闽人到外地,都以经商为主,他们构成了一张遍布东亚、东南亚的网络,参与各类商品的经营。这张网络,以海洋为其主要分布地,形成了“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建人,凡有福建人的地方就有妈祖”的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徽商主要靠食盐垄断发展起他们的事业,最终也因食盐垄断

的取消淡逝于历史的长河中;山西票号商人,也因为银行业的崛起,成为历史的过客。闽人所依赖的大海,自古以来都是贸易的主要通道,而闽人掌握的航海技术,一直领先于东亚、东南亚国家,他们在航海的过程中编织了遍布亚洲乃至世界的商业网络,这一网络是闽商赖以生存的根基。闽商在历史上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成为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商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闽商依托大海织成的、遍布世界的商业网络。只要这一网络存在,闽商就永远会有发展的机会。

三 闽商是世界商业文化精华的继承者

商业是一种文化,它由一系列价值观和经商技巧组成。不要以为谁都可以经商并成为巨商,若非在传统商业文化中浸润中潜移默化,福建商人的经营,不会那么顺利。是传统的商业文化给予闽商各种商业技巧,也是传统的商业文化使闽商有了百折不挠的精神,因而他们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崛起,并依托传统的商业文化将困难化解。可见,传统的商业文化,是闽商长久不衰的力量源泉。

福建是外国人进入中国时的一扇大门,自古以来就与海外各国保持联系。因而,福建的城市中,常有外国人居所。南朝陈时期,印度名僧拘那罗陀在南安郡建造寺挂锡,欲候船归国,于此地重译佛教名著《金刚经》。据福州发现的唐元和年间的冯审《球场山亭记》,其残文有:“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①这说明有不少海外来人住在福州,乃至福州风俗受影响。大历时诗人包何咏泉州:“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②唐末诗人韩偓咏福州:“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③这都说明早在唐代,就有不少外籍商人来到福建沿海。近年在泉州发现了一座南唐时期的石经幢,上面署名为:“州司马专客务兼御史大夫陈光嗣,州长史专客务兼御史大夫温仁俨”。^④可见,当时来到福建的外商不少,乃至福建官方设置了“专客务”这样的官职,专门招待海外商人。

宋朝在泉州设市舶司,并派人到海外招商。《宋史·食货志》记载: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船舶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⑤《宋史·閩婆传》又载:“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

① 陈叔侗《福州中唐文献子遗》附图,载: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

② 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全唐诗》卷208。第2170页。

③ 韩偓《玉山樵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第38册,第17页。

④ 林宗鸿《泉州开元寺发现五代石经幢等重要文物》,泉州《泉州文史》第九期。

⑤ 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第4537页。

假其乡导来朝贡。”^①毛旭之所以得到朝廷的赞赏,是因为他带来了海外国家的进贡。由于海外巨商不断来闽,泉州渐有许多番商定居,北宋郑侠的《西塘集》说泉州:“闽山佳处,封疆阔远,人物庶繁,驿道四通,海商辐凑,夷夏杂处。”^②南宋时,泉州已出现了蕃坊,“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玢、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③《夷坚志》记载:“政和中,南蕃舶来泉州。”^④元代色目人在朝廷理政,泉州的外籍商人更多。马可·波罗说:“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⑤泉州市街十分繁华,吴澄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⑥在泉州发现的元代蕃客墓刻石,数以百计。他们财大气粗,令人侧目,蒲寿庚家族集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于一身,“泉人避其薰炎者十余年。”^⑦蒲氏女婿回教徒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他死了后,仅留下的珍珠即有一百三十石。^⑧这些番商过着极为豪华的生活,“满市珠饥醉歌舞,几人为尔竟沈酣”。^⑨元代泉州番商的影响由此可见。

就泉州的考古发掘来看,宋元时期的泉州有天主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佛教等异域宗教传播,它说明来到泉州的番商有欧洲、西亚、南亚、东南亚各地商人。在那一时代,这些商人实际上代表各地海洋文化的最高水平,带来了各自的商业文化。明清之后,大批外籍商人同化于华人之中,他们也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文化融入闽人的社会。所以,闽人的商业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业文化的结晶。孙中山在生前常爱说的一个例子是:他在海外的一个码头看到一个闽南小贩与犹太商人竞争,两个斗智斗勇,用尽各种办法,几个月之后,犹太商人自认失败,灰溜溜地搬到其他地方。要知道当时的犹太商人是世界上公认的最精明的商人,也是无往而不胜的商人,不论是在欧洲还是美洲,他们都击败了有政权作为后盾的欧美商人。然而,在东南亚的一个小码头,他们却失败了!是败给中国

① 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九,阁婆传,第14092页。

② 郑侠:《西塘集》卷八,代谢仆射相公,第20页。

③ [宋]祝穆:《方輿胜览》卷十二,泉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宋本,第7页。

④ [宋]洪迈:《夷坚志》,《夷坚三志已》卷九,婆律山美女,第1370页。

⑤ 陈开俊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192页。

⑥ [明]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八,送姜晏卿赴泉州路录事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页。

⑦ [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五二,蕃德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点校本,第4496页。

⑧ [元]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9~30页。

⑨ [明]贡师泰:《玩斋集》拾遗,《泉州道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页。

一个不起眼的闽南人小贩！孙中山从中看到华商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坚强了革命的信心，也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抱有更大希望。其实，这个犹太人的失败并不冤枉，他所面对的虽是一个小小的闽南商人，但闽南人继承了中世纪最优秀的商业文化，并在这类文化中注入了中国人坚忍不拔的精神。这样看来，犹太商人的失败是很正常的，他败给的是中世纪以来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业文化，其中，也包括了犹太人商业文化的结晶。因为，他们也曾是泉州港的客人，曾将犹太人的商业文化带到东方的第一大港。不同的是，闽南人不仅吸取了犹太人的商业文化，还吸收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的商业文化，并以中国的商业传统作为基础，加以融会贯通。所以，闽南人的商业文化是最精彩的。公平地竞争，中国商人不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商人集团。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总之，闽商是中世纪世界商业文化精华的继承者，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闽商得以超越众多商帮、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北大商业评论》2010年第7期）

论唐代的闽越遗风与闽人的海商传统

唐代中叶,文学家独孤及评价闽人:“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有无诸、余善之余俗。”^①在这里,他直接将闽人的重商习俗与历史上的闽越族联系起来。闽越人擅长航海,具有重商习俗,二者的结合,推出了闽人经营海洋商业的传统。福建海商是基于本土文化传统发展起来的商人集团。

一 两汉六朝古闽人的航海传统

闽越是汉高祖的封国,首任闽越国王无诸在秦汉之际的战争中一直跟随刘邦打天下,因而得封闽越王。汉武帝元封九年(前110年),闽越国被汉军所灭,其后闽越人逐步融入汉族,但其习俗也被带入南方汉族之中。

越人有着与中原汉族不同的习俗。如果说重农轻商是中原一带流行的观念,那么,这种观念根植于汉人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对土地的忠诚成为人格衡量的标准。他们对商人的贱视,是因为商人过着流浪的生活,四处飘荡,对土地缺乏感情。越人的生活方式不同,越人发源的吴越是江南水国。“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浚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②因此,吴越文化以水上生涯为其特点,《越绝书》记述越王句践自评越人的习俗:“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③事实上,越人主要生活于溪河之畔、山岭之下,水中的鱼虾蛤贝是他们的食物,因此,他们的生活介于农民与渔夫之间,为了寻觅食物,他们经常乘舟往来于河流之上,因而形成了以流动为主的生活方式。《吕氏春秋》云:“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淮南子·齐俗训》也说:“胡人便于

① 独孤及:《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独孤及:《毗陵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页。

② 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四,计倪内经,岳麓书社1996年,第104页。

③ 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第十,岳麓书社,1996年,第123页。

马,越人便于舟。”可见越人生活中舟船使用之广。对商业而言,这些舟船恰是最好的运载工具。闽越人继承了越人水行山处的文化传统。《汉书·严助传》记载闽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史记》记载:“至(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所谓揭扬,即广东潮州境内的揭阳县,余善从福州率士卒八千人航海至揭扬,是一次相当规模的航行。其后,汉武帝“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句章是浙江境内的港口,韩说从这里出发,航行到东冶,这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航行。^① 闽地归汉之后,东冶成为台湾海峡交通线上的著名港口。当时涉及南海的大规模海上活动,几乎都要经过东冶。

三国时期,东吴割据东南,以水师著称于世。左思的《吴都赋》云:“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② 这说明在吴国时期,它的水手主要来自闽中与岭南。《宋书》记载,吴国在建安郡设有典船校尉,此外,闽中还设有温麻船屯,亦见沈约《宋书》的记载,晋太康四年(283年),在温麻船屯置温麻县。^③ 吴国在闽地设置两大造船中心,说明它对闽越人航海技术的信赖。^④ 吴国建衡元年(269年)冬十一月,吴国曾派大军“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⑤

南朝以后,生活于东南沿海的疍家人成为闽越海洋文化的继承者。宋代的《福州图经》记载:“闽之先居于海岛者七种,泉水郎其一也。”^⑥他们生活在福建、浙江、广东沿海,以船为家,过着打鱼为生的生活。福建史籍记载他们是卢循的部下:“泉郎,即此州(泉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⑦隋朝灭陈之际,沿海船民再一次出现于史册。其时,隋朝大将杨素进入东南,击败南安豪强王国庆部,“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曰游艇子。智慧、国庆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说国庆,令斩智慧以自效。国庆乃斩智慧于泉州。”^⑧其中的游艇子,便是后世的疍家人。宋代福建人所造海船与疍船十分相似。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他在宁波雇佣的福建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其制皆以全木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第2982页。

② 萧统编:《文选》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清胡克家校刊本,第92页。

③ 沈约:《宋书》卷三六,州郡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93页。

④ 参见:朱维幹《福建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61页。

⑤ 陈寿:《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167页。

⑥ 刘纬毅等:《宋辽金元方志辑佚》,上海古籍社2011年,第385页。

⑦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二,风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29页。

⑧ 李延寿:《北史》卷二九,杨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512页。

巨枋挽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可见,这是一种体型狭长、尖底的海船。1974年8月,在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宋代的海船,其水下残长24.20米,最大残宽9.15米,残深为1.98米,复原后,其长度应为34米,宽度为11米,深度为4.21米^①,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的福建客舟有些类似。从这些史料与发掘遗物来看,宋代闽船的特点是船身狭长,上宽下窄,吃水较深。这类船型不怕海浪冲击,利于远洋航行。从船型来看,它显然与蛋船有一定关系,《太平寰宇记》记载蛋家人的‘了鸟船’:“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②,这正是福建海船的起源。

二 唐代的闽越遗风与重商传统

晋唐以来,中原及江淮民众不断南下闽中,尤其是唐中叶乱后,北方陷入长达两百年的混乱,中原民众南下数量和波次都增加了。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移民活动是唐末光州刺史王绪率数万光州、寿州移民南下福建,而后,其队伍中的王潮、王审知兄弟建立了割据闽中的威武军政权。在这个政权的统治之下,闽人与北方移民融合为新的福建人,成为当代福建人的祖先。从此,福建人作为汉族的一支为世人所熟悉,但其文化中也保留了许多闽越文化的特色。这是我在《福建通史》的唐五代部分及宋元部分所表达的观点。

福建的闽越族血缘,带给了福建人不同于北方的一些习俗。唐代独孤及《送王判官赴福州序》云:“闽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岁比饥馑,民方札瘥,非威非怀,莫可绥也。”^③刘长卿的《送乔判官赴福州》:“扬帆向何处?插羽逐征东。夷落人烟迥,王程鸟路通。江流回涧底,山色聚闽中。君去凋残后,应怜百越空。”^④他又有一诗:《送张篆之福州谒鲍大夫》:“万里闽中去渺然,孤舟水上入寒烟。辕门拜首儒衣弊,貌似牢之岂不怜。”^⑤皇甫冉的《酬李郎中侍御秋夜登福州城楼见寄》说:“辛勤万里道,萧索九秋残。月照闽中夜,天凝海上寒。王程无地远,主意在人安。遥寄登楼作,空知行路难。”^⑥可见,在唐代官员的眼里,闽中是一个荒凉的蛮夷之地,其风俗与北方不同。唐代中叶,刘禹锡说福建:“闽

① 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7页。

②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二,风俗,第129页。

③ 独孤及:《毗陵集》卷十四,送王判官赴福州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页。

④ 刘长卿:《送乔判官赴福州》,《全唐诗》卷一百四十八,刘长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页。

⑤ 刘长卿:《送张篆之福州谒鲍大夫》,《全唐诗》卷一百五十,刘长卿,第18页。

⑥ 皇甫冉:《酬李郎中侍御秋夜登福州城楼见寄》,《全唐诗》卷二百四十九,皇甫冉,第5页。